

一槌定音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是任何区域贸易安排都无法替代的。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柄小木槌，通体红褐色，长32.2厘米，宽10.5厘米，厚6.3厘米。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它或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却见证和亲历了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WTO），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被称为“经济联合国”，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该组织的前身是1947年10月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23个创始缔约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台湾当局于1950年非法“退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又于1965年申请成为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观察员。随着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政治问题上遵循联合国的决定，因此，台湾当局的观察员地位被终止，大陆也逐步恢复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内改革的推进，实行对外开放作为重大战略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

政策”“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他还强调，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列席会议、成为观察员、开展非正式磋商等形式加深和转变对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性质的了解。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于1986年7月作出申请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复关”工作。1987年3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国工作组成立。随后，各成员国方启动对我国的咨询和审议。

对于一个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多边组织来说，搞“市场经济”是执行其规则和协议的重要前提。因此，“复关”首先要完成对我国贸易体制的审议，即我国的经贸体制是否适应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建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回避“市场经济”。这也让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进展不大，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时，会议主席使用过的木槌

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也使得“复关”谈判取得巨大突破。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我国“复关”谈判进程。

1992年10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国工作组第十一次会议在日内

瓦召开，正式结束对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审议，继而转入市场准入的实质性谈判阶段。1994年4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全球多边谈判达成建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一年后正式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我国“复关”谈判也随之转为“入世”谈判。

当时，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与世贸组织共有130多个成员，其中有37个成员提出与我国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主要涉及降低关税、取消进口限制、开放服务贸易等内容。谈判过程中，我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不仅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贸组织中占主导地位，而且美国还能够支配其

他西方国家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和它保持相同或相似，在他们同我们谈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时，从来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始终与政治问题挂钩。因此，中美双边谈判成为我国“复关”“入世”最艰难的博弈，这期间可谓跌宕起伏、山重水复。针对美国对我国采取“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策略，我们也坚持以两手对两手，以斗争促合作。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时，阐明中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我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坚持这些指导原则。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谈判中提出的高要价，从政治上、战略上考虑，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了“态度积极、方法灵活、善于磋商、不可天真”和“态度积极、坚持原则、我们不急、水到渠成”等工作方针。

经过反复较量和艰苦谈判，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清除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大障碍，有力推动了我

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谈判。2000年5月，我国与欧盟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9月，我国与墨西哥结束双边谈判，至此，我国完成了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不久，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多边文件，提交部长级会议审议和批准，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一槌定音，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同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名成员。

实践证明，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参与制定规则和竞争的有利位置，从而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天地，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2001年至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从11.1万亿元增至101.6万亿元，占世界比重从4%增至17.4%。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增加全球民众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向未来，我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供稿）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支见证香港问题和平解决的台式英雄金笔，笔长20厘米，笔台纵15厘米、横15厘米；在它旁边，还有一个见证澳门问题和平解决的会议桌旗，通高41.8厘米，通宽49.5厘米。

香港、澳门问题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按照《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签订）规定，新界（占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2%）租期为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期满。澳门，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

党对历史遗留问题高度重视，在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寻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在同西方记者谈话时就“香港问题”指出：“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到香港、澳门问题时提出：“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临近届满，英国政府试图借机向我国施加压力，取得管治香港的长期权力。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提出的在1997年6月以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邓小平强调：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解

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中国政府就处理香港问题确定了两条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是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明确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邓小平还强调：“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和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坚定决心。通过这次会谈，中方掌握了收回香港的主动权，中英两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

谈判开始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草拟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1983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这个12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繁荣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14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邓小平还指出：“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9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

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12条’。‘12条’里面有个‘50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

1983年6月，邓小平接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谈到人们总是担心1997年以后这一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时指出：“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50年不变好不好？50年够长了。讲50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在谈到香港过渡时期问题时强调：双方都不要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

在前三轮谈判中，英方执意

“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同意交还主权，却坚持治权不放，还通过舆论工具宣扬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就在中英香港谈判出现紧张状态之际，1983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谈到香港问题，请其转告撒切尔夫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

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中英双方经过22轮谈判，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政府总理和英国首相在签字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使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0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1986年6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谈判比较顺利，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桌中央摆放中葡两国国旗，中国政府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澳门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

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是正确的，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香港、澳门回归20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坚实的基础，有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实践一定能够再谱新篇章，香港、澳门一定能够再创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供稿）



中英政府签字时使用的国产台式英雄金笔



中葡政府签字时使用的两国国旗